

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高应达

(铜仁学院 政史系, 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近代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交往是以西方宗教文化为前趋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如此。本文详细梳理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铜仁地区的传播历史,以及少数民族接受基督教和天主教文化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 基督教; 天主教; 少数民族地区; 传播

中图分类号: B9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39(2008)06-0065-04

近代西方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首起于宗教的传入,宗教文化成为内地少数民族最先了解西方先进文化的窗口,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和生活观。

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在不对等的环境中,即以冲突的形式展开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黔东铜仁等地的传播,大概可以分成两大阶段:明末清初到道光年间为天主教的秘密传播时期,道光后期至民国年间的发展时期。当然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宗教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也有一个由禁止传播到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两个阶段,因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本文只作简要的介绍。本文所指西方宗教,只涵盖天主教和基督教,其他宗教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1. 天主教在黔东各地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历史

1.1. 天主教在黔东铜仁各地少数民族中的秘密传播阶段及其特点

据法文本《贵州教史》载:“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巴侣主教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死于福建,约在同一时期,贵州石阡发现有姓沈的教友”^[1]。这是铜仁少数民族最早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的历史记载。西方宗教传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南明政权在贵州的活动有关^[2]。

由于南明皇室,特别是内宫大部分人信仰天主教,

一定程度上对百官众臣产生影响。当南明政权失败后,这些人便散落或归藏于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了少数民族地区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这些南明遗民,面对清王朝的统治,只能秘密生活于民间,很大程度上只能自己坚守信仰,即使有传教活动也只能在自己的子弟中传播,不可能在民间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在1684年以前,西方宗教传播往往只能秘密进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贵阳成立代牧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公开传播。可是罗马教皇却于1704、1715年两次颁布“禁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禁止中国教徒使用“天”或“上帝”的称呼,禁止在教堂内悬挂“敬天”的匾额。罗马教廷无视中国的传统,完全照搬西方的圣经教义,试图将宗教的权威和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做法,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坚决抵制,康熙也认为这干涉中国内政,遂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查禁全国天主教。贵州地方政府也对天主教的传播进行了严格查禁,而且时间最长。雍正、乾隆皆严厉查禁天主教,并令广东巡抚孙士毅向在华西人、洋商发出警告:“如再有干犯功令,私行派往者,必当从重严办,不能再邀宽典。”^[3]故而抑制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贵州的传教活动越来越秘密。铜仁石阡的天主教传入较早,并没得到很大发展。嘉庆十七年(1812年),清廷风闻贵州传习天主教,各乡聚集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清廷“谕令”将首恶严惩。

收稿日期: 2008-06-12

作者简介: 高应达, 铜仁学院政史系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明清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史。

嘉庆年间,江西天主教徒吕姓,因躲避官府查禁,潜来石阡城外居住,秘密在家中从事宗教活动。道光初年,原随法国传教士来贵州秘密传教的中国“传教先生”孙本笃潜入石阡,与吕姓教徒会合,在家中秘密传教,并为吕子忠文、沈锡之、冉镜臣等秘密洗礼入教。同期,居住于思南县城的四川籍商人在家中秘密举行宗教信仰活动,并开始秘密接收信徒。

1.2. 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的传播开始公开化,特别是1860年,中法中英《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特权,天主教在黔东各地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法国传教士董文灿曾在距石阡不远的苏羊场子一带传教,石阡的天主教徒发展到20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贵阳天主教区设立石阡分教区,同时增加了在蒙古地区入教的沈姓教徒;石阡人沈老四在贵阳入教,并与王姓教徒结婚后回到石阡。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贵阳教区指定传教士林若瑟、扶苏二人负责石阡教务。是年,石阡雷家屯人雷南轩、雷成哉(一说雷世贵、雷朋南)因与中坝李姓人打官司,诉至省城,获贵阳天主教的资助而入教。时因清军在石阡与“号军”激战,宗教活动受到严密监视,雷等回家劝导族人入教未果。次年,贵州提督田兴恕、贵州巡抚何冠英密令全省在适当时机杀掉传教士。省内凤闻青岩、开州两处发生教案,铜仁各地的传教活动再次转入高度秘密活动状态。

咸丰九年(1859年),天主教传入德江县境。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直属罗马传信部)传教士布沙尔·嘉略到大堡(现德江县城城区一带)、煎茶进行传教活动,嘉略在大堡场老街买一民房作传教活动场所。由于当时境内禁教,其传教活动没有多大成果。

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谕令惩办田兴恕。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贵州巡抚提督张亮基联衔布告,晓谕全省官民,天主教“止以劝人为善,并无他意,诸色人等是否情愿习教,各听其便”,给予天主教徒大力支持;同时对地方官民施以极大压力,“倘经此次训令仍有不守大义之徒,固执偏见,挟私逞忿,欺凌扰害,或则逞浮言,捏词倾陷,则是肇衅,定予严拿究办,处以违抗谕旨之罪,决不姑宽”^[4]。石阡雷家屯雷姓族长雷应连于此时才下定决心,劝其族人男女500余人集体信仰天主教(后有一百余人退教)。接着与雷家屯有姻亲关系的坎嘴马姓近百人,在其族长马全真的率领下信仰天主教。与马姓有姻亲关系的何、向、姚三家也相继信仰天主教。据光绪十五年(1889年)统计,石阡、平越二县共有28个传教点,教徒683人,绝

大部分是石阡教徒。石阡天主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同治六年(1867年)到民国初期,石阡先后有施绵、骆输清、丁若望、郭德祺、尚友善、陶汝仁、翁儒、路德明、罗伯雍等传教士常住石阡传教。贵州主教李万美、博德业、苏德文、润章等亦分别巡视石阡教务。光绪十四年(1888年),丁若望在吕姓后院修建一座木结构的教堂。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年),教徒陶汝仁新修经堂及北楼于西城北侧。

德江天主教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光绪八年(1859年)于大堡场盖天主教堂,因群众阻止未成。到1889年时,德江共有41个传教点,天主教徒912人。1898年9月法国神甫卜多禄·士杰在上街建起一幢五柱四列三间的木结构经堂。民国十六年(1927年),德国耶稣圣心会接替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德江传教,属石阡临界牧区,包德美任神甫。

民国初年,贵阳教区遵照罗马教廷旨意,将石阡划归美国苦难会传教。民国十年(1921年),苦难会派艾、孙二传教士来石阡,见堂区狭小,财产全无,数月后离去。次年,路德明在石阡增建教堂南楼、药房、诊所、学堂等砖木结构房十余幢,并在天主教会四大瞻礼日向对外开放,加大活动强度,并设诊所为非教徒免费治病,以吸引民众入教。同年,罗马教廷将石阡划给德国耶稣圣心会负责传教活动。

民国十三年(1924年)天主教开始“中国化”,在石阡起用中国神甫胡柱臣任石阡天主堂本堂。同年,德国圣心会传教士文德海(任教区长)、包德美和一个孙姓神甫接管石阡教区。民国十七年(1928年)德国传教士步和施、贝兰德、高溪伯三人来石阡,包德美继续任教区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位德国寡妇捐巨款修建德江经堂,1934年落成,德江首次出现西式砖木结构建筑。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罗马教廷批准石阡分设教区,定为临界牧区,石阡对主教府进行规划和建设,修建了神甫大楼和修女大楼。同年,石阡天主堂有德国籍传教士、修女、修士共35人,分住3个传教点,有教徒近300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石阡临界牧区正式成立,步和施任主教,下辖石阡、余庆、凤岗、德江、务川、沿河、思南、印江、江口、松桃、铜仁、玉屏、镇远、三穗、天柱、锦屏、黎平、从江、榕江、剑河、麻江、黄平、施秉、台江24县25个教堂口。

至解放前夕,石阡县天主教徒发展至1000余人,并建有数处天主堂,如雷家屯天主堂。德江天主教在县城、火石坡、王家林建起了三处天主教正堂,直属石阡临牧

区；同期，德江天主教还在境内建起了马家沟、三大湾、桃子坳、刘家山、明溪、松溪、奋阡等村寨天主堂，并在沿河县境内建有茶园天主堂，在务川境内建有马家坡天主堂。在这些堂口上，常常是整村整族加入天主教。1951年德江县人民政府对县城、马家沟、三大湾、刘家山、奋阡、王家林6处进行统计时，有天主教徒1553人。

天主教在铜仁地区其他县的发展远远不如石阡、德江二县。铜仁县于民国15年（1926年），首次法国传教士谭尚德入铜仁传教，同时从贵阳带来四名贵阳籍修女，租用后水门三宝宫私房一幢共11间作为天主教堂，开始传教。1928年德国传教士毛汉东由上海来铜仁，随行有包、布二神甫，协助谭尚德传教。谭尚德在铜仁8年，共发展教徒41人。谭尚德离开铜仁后，毛汉东神甫负责全部传教工作，截至1949年，铜仁仅发展了天主教徒83人。

思南天主教在嘉庆年间由四川商人带入，但一直未能发展起来。1900年，法国籍翁神甫由贵阳来到思南城，在南门购地修建教堂，隶属于贵阳教区。后来，中国籍神甫罗伯雍先后在思南王家沟、倒流水建立分堂，德国籍神甫傅志强在胡家寨建立分堂。1937年改属石阡教区管辖。全县教徒最多时达五六百人。

沿河县于民国末年，一位姓何的外籍天主教神甫，云游至沿河境内，在茶园村买下三间民房，作为教堂，开始传播天主教，发展了34名教徒。

印江县于1931年，思南县一名神父迁至印江县坪兴寨黄金顺家居住，天主教从此开始传入。1933年，神父推荐黄金顺之子黄吉山到石阡神父学校读书，黄吉山后来在思南天主教堂领受洗礼，加入天主教。1936年，印江镇峨岭村人戴子生、戴世方到黄金顺家中领受洗礼。1938年，天主教传入木黄一带，并在木黄修建教堂1栋3间，教徒增至18人。1949年，全县有教徒90人，印江镇70人、木黄20人。

新中国建立后，各地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人民政府实施正确的宗教政策，德江、石阡、铜仁3县天主教堂先后恢复宗教活动，但其成员基本是老教徒，新增教徒不多。

2. 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历史

基督教最早传入贵州是光绪三年（1877年），即在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后，才进入黔地。光绪三年（1877年），英国基督教属灵派内地传教士祝名扬，由湘入黔，在贵阳开堂布道。

1912年，美国传教士白道启、何茂林从湖南沅陵进入铜仁，并依靠在湖南培养的几名中国传教士开展活动。

不久，成立“铜仁中华基督教会”，又称福音堂，直接受长沙“遵道会”（西差会）的管理和沅陵“区监督”的督导。抗日战争时期，由美国传教士和地方牧师10余人，组成“巨头会”，领导教会工作。抗战胜利后，“巨头会”改为“行政委员会”，负责管理教会工作。同时，组织青年会、教职员“团契会”、主日学、勉勵会、祈祷会（修养会）、查经班、妇女布道会、奋心会等组织开展活动，宣传“对经”，发展教徒。1912~1949年间，来铜仁的美国传教士先后共26人，建立堂会4个，训练传教骨干61人（其中牧师11人，传教士14人），发展教徒350余人。这些教徒多数居住在铜仁城里，农村仅有13人。

民国初年（一说光绪末年），英国传教士R·A·勃沙特到石阡传播基督教，时称“福音教”，并设福音堂为传教场所。勃沙特在其回忆录中记其为“基督女子传教会”，发展了潘、杨、胡等几家女姓教徒，逢节日向参观者赠送圣画像、金属十字架等物，晚上开放幻灯宣传基督教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勃沙特离开石阡，因后继无人，其教便不存在了。

光绪34年（1908年），基督教士来到思南石门坎租赁邵氏宗祠挂匾“福音堂”开始传教。1918年，英国传教士白牧师夫妇由遵义教区来到思南，租烟市巷张姓房子作教堂传教，1年后回遵义。1919年白牧师与传教士廖俊山（四川人）入思南传教。此后，白牧师往返于思南、遵义之间，廖俊山则常驻思南开展传教活动。后教堂从张氏房子迁至郭家龙门，不久又迁至石家嘴林姓住宅，并改名为“内地会思南福音堂”。不几年双迁普济街邵姓住宅。1931年起，有英国籍林、艾（女）传教士，遵义教区布道队长谭以若（遵义湄潭县人）、英国籍罗伟德夫妇先后到思南传教。1941年5月，四川省西阳龙潭宣道总会派美国籍郑牧师到思南接管基督教会，并改名为“宣道会思南福音堂”，属龙潭教区直辖。不久松桃人宣道会队长向日宣、副队长汪继祥到思南传教。1943年，龙潭总会负责人、美国籍牧师包宗杰来思南，并在烟市巷租张姓住宅重修教堂；不久美国籍白教士、上海人王教士、湖南澧县人张昌万等先后接管基督教会。至民国末年思南发展基督教徒不超过50人。1950年后，思南基督教会停止了一切活动。

民国十年（1921年），湖南芷江基督教会德国籍牧师包格非、赖承光和中国传教士刘春吉等人，以包格非为布道队之首，到玉屏县城北街租赁陈家房屋，设立布道所。这是基督教第一次进入玉屏桐乡中传教。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发展信徒30余人，始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晃县区堂会玉屏分会，同时创办福音诊所。民

国三十五年(1946年),玉屏教会在城内修建木瓦房教堂一幢,并在新店乡干山坡设立聚会点,由教徒杨再宪义务主持传道活动。到1949年时,全县有基督教徒140人,基中有40余人家住干山坡。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英国传教士在省溪县城(现万山特区)中街建立福音堂,发展教徒130余人。1946年传教士离去,教会活动逐步停止,房产变卖。

民国中期,一外籍传教士到沿河传播基督教,至民国末期发展教徒100余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基督教传入印江境内,传教士在木黄镇下街田道成家设立“福音堂”开展传教活动,1949年“福音堂”迁至木黄老寨杨浦光家中,发展教徒200余人。

解放后,许多传教士及神职人员凭借其传教特权,与人民政府为敌,做出了许多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情,甚至勾结反动势力组织武装叛乱,成为当时帝国主义的帮凶,先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一部分外籍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众停止了教会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重新开展教会工作,德江、石阡天主教堂正式移交给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教徒们在“中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的指导下重新开始教会活动。

早在明代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即采取“中国化”的传教方法,力图使天主教“儒学化”,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这种温和的传教方式,再辅以传播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使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由于传教士在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播上帝福音,以征服中国,加以东西方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始终不断。特别是康乾年间严厉查禁西方宗教,使正常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西方文化在传播进入东方各民族的时候,由于其常常是作为西方宗教传播的辅助手段,因而,少数民族对西方文化也只能通过西方所传播的宗教文化来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色。特别是西方宗教传入后在各地开展传教活动、修建教堂的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其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纷纷在各地开设免费诊所、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活动,丰富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

活,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观念和文化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由基督教内地会在铜仁开办的“福音医院”是贵州省一所西医医院,基督教办起的医院和诊疗所,也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第一批医务人员。教会学校,特别是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就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来说均属于近代教育的范畴,有利于科学知识的传播^[5]。

参考文献:

- [1] 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石阡县志(第二十篇第三章) 宗教·天主教[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2] 参见作喆·南明水历朝皇太后、皇后与皇太子皈依天主教. 紫禁城, 1985-00期(源于中国知网).
- [3] 张岂之. 中国古代史(元明清卷)·清高宗实录(卷1227)[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50.
- [4] 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石阡县志(第二十篇第三章) 宗教·天主教[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5] 贵州通史编委会. 贵州通史(第三部)·清代的贵州[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838-848.
- [6] 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仁市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 [7] 思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思南县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 [8] 江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口县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9]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玉屏侗族自治县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12] 松桃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松桃苗族自治县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德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德江县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14] 石阡县志编纂委员会. 石阡县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15] 万山特区志编纂委员会. 万山特区志[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下转 72 页)

5~6千人。^{[4]3-6} 抗战期间工商业的发展,使黔北的产业工人达到上万人,加上手工业雇佣工人和其他工人接近2万人。^{[4]29-30}

3. 4. 为黔北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抗战时期黔北工商业的发展,为黔北以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抗战结束后,第41兵工厂的部分机器设备移交给了地方,一些停办或者东返的工厂留下了厂房和一些机器设备。在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技术工人很多留在了黔北地区,成为建国初期黔北工业企业的技术骨干。桐梓农机厂有部分退休老技术工人就是原第41兵工厂留下的职工。^{[3]312} 大兴面粉厂的官股部分和遵义酒精厂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黔北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对黔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何仁仲. 贵州通史[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 [2]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贵州茅台酒史)[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79.
- [3] 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 遵义抗战纪事[Z]. 黔新出[图书]2005年内资准字第399号, 2005.
- [4] 刘 琨. 遵义市工运简史(1910-1990)[M]. 遵义市总工会编辑出版, 黔新出(94)内图资准字第2-030号, 1994.
- [5] 周春元. 遵义人民革命史[M]. 内部资料, 1984.
- [6] 周天豹等.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工业发展考察[J]. 开发研究, 1986, (2).
- [7] 孙 健. 中国经济通史(中卷, 1840-1949)[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North Guizhou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ang Buan¹ Min Tingjun²

(History department of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Guizhou 56300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northern region of Guizhou as one of the rear areas establishes one batch of the modern industry and a great numbers of stores in the city, which makes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develop greatly. This is the result of many kinds of factors under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ha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nither for the situ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r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north Guizhou Province in that and following time.

Key words: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North Guizhou Provinc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责任编辑 段振良)

(上接 68 页)

An Analysis of the Disseminating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Catholicism in the Minority Area of East Guizhou

GAO Ying-da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Abstract: The exchange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begins with the Western religions, and it is also true in the minority areas. This paper is to hackle the disseminating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Catholicism in Tongren Prefecture,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 minority people gradually accepted the Christian and Catholic religions.

Key word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Catholicism; the minority areas; 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 段振良)

天主教、基督教在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探析

作者: [高应达](#), [GAO Ying-da](#)
 作者单位: [铜仁学院, 政史系, 贵州, 铜仁, 554300](#)
 刊名: [铜仁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8, 10(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5条)

1. 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石阡县志\(第二十篇第三章\)宗教@天主教](#) 1992
2. 作喆·[南明永历朝皇太后、皇后与皇太子皈依天主教](#) 1985
3. 张岂之 [中国古代史\(元明清卷\)@清高宗实录\(卷1227\)](#) 2001
4. 贵州省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石阡县志\(第二十篇第三章\)宗教@天主教](#) 1992
5. 《[贵州通史](#)》编委会 [贵州通史\(第三部\)@清代的贵州](#) 2002
6. 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铜仁市志](#) 2003
7. 思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思南县志](#) 2002
8. 江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口县志](#) 1994
9.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 1993
10. [玉屏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玉屏侗族自治县志](#) 1993
11.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 1992
12. [松桃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松桃苗族自治县志](#) 1995
13. [德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德江县志](#) 1994
14. [石阡县志编纂委员会](#) [石阡县志](#) 1992
15. [万山特区志编纂委员会](#) [万山特区志](#) 1992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戴燕](#), [DAI Yan](#) [青海省基督教、天主教发展状况及社会影响研究](#) -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

近些年来,青海省天主教、基督教发展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西宁、大通等城市,信教人数不断上升,且信徒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调查显示,信徒在皈依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后,自身的心态和行为都有良好变化:严格规范个人行为,努力改善家庭环境,影响子女在社会生活中有更好的表现。天主教、基督教在现实处境中的这种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2. 期刊论文 [何成武](#), [HE Cheng-wu](#) [商丘市基督教与天主教发展状况浅析](#) -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1, 17(1)

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商丘市的存在与发展,有其深刻的根源和社会心理因素。为加强对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事务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商丘经济建设,就必须健全宗教管理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基督教、天主教爱国团体搞好自身建设。

3. 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须欲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自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传统反教思想、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新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不管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垮。第五章分

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断绝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4. 期刊论文 [韩荣钧. HAN Rongjun 抗日战争时期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略论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4)

20世纪的日军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其疯狂侵略。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天主教、基督教上层势力,基本上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采取一种中立甚至袒护、支持日本侵略的态度。但这不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的全部,广大的爱国教徒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以无畏的牺牲精神投入到神圣的抗战中去,应把广大宗教人士的爱国实际行动与宗教上层的反动指导思想区分开来。

5. 学位论文 [蒲娟 近代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研究\(1840-1919年\) 2007](#)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的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曾传入中国,并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四川地处中国偏远的西南地区,水陆交通均不发达,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传教重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曾传入四川地区,并积极发展教育、医疗等慈善事业,但同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进入,又难免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风俗习惯等产生矛盾,因此四川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教案频发地之一。而天主教与基督教本身作为不同的宗教派别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即是对近代(1840年—1919年)四川地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活动分别作了梳理,归纳其特点并分析其原因。首先是对四川地区天主教与基督教发展情况的概述,四川地区天主教的控制权大部分时间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把持,其传入四川的时间早于基督教两百多年,并在此持续发展;传入四川的基督教则主要是以英美等新兴资产阶级为支持,虽然发展时间上相对要短一些,但发展势头却后来居上,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其发展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其次分别论述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教育和医疗是教会传教的主要手段,对当地的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在这两部分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各自所办学校和医院等史实作了梳理,并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总结了在四川地区教会所办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点以及对四川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四川地区的教案以次数多、规模大、赔款重而闻名全国,因此本文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主要教案分别作了叙述并归纳其特点。最后总结了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四川地区传播的差异并从宗教和政治外交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所谓传教事业并非简单的文化侵入,其背后必然是以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中国,在中国攫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为目的的。

6. 期刊论文 [舒景祥 关于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 ""\(3\)](#)

本文介绍了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强全省天主教、基督教工作的措施和总体思路。

7. 期刊论文 [施雪琴 论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的历史背景 -南洋问题研究2001, ""\(3\)](#)

对大多数殖民国家而言,15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而来的。基督教在近代欧洲的海外扩张中充当了侵略工具,它的海外扩张是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产物。本文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探讨了近代基督教传播的二重性,并在基督教东扩史和欧洲扩张史背景下来探讨了西班牙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

8. 学位论文 [李国辉 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 2007](#)

天主教于鸦片战争前在东北地区就有传播,基督教则在1852年进入东北。本文以东北地方志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了1912年前天主教、基督教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状况,试图对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进行探讨。

全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介绍了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情况。西方传教士借助条约特权的保护打开了在东北传教的通道,营口开港对洋教在东北传入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列强向内地渗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教堂早期多分布在地方沿海中心、经济中心以及交通线附近。天主教相对于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侧重于内地,深入农村。

第二部分,阐述了清末洋教在东北的活动。天主教与基督教为了扫除传教的障碍,兴办了大量的社会事业,包括医疗、教育、社会改良、慈幼等。由于自身的特点,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地区采取了不同的传教方式,在社会事业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基督教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教育事业方面,天主教侧重于神学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的小学教育,基督教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成绩突出。天主教传教士要比基督教传教士更注重开设教会的慈幼事业,社会改良及救济事业则是基督教的热心所在。

第三部分,分析了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造就了一群信仰与传统不同的民众,使得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复杂化,并引起了相互的冲突。传教士开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加速了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当一部分传教士是作为列强的侵略势力而来到中国的。这部分传教士倚仗传教特权势力在中国作威作福,勒索教案赔款,霸占田产,强取豪夺,欺压官民,与洋教传入的积极作用相比,其消极作用同样明显。

9. 期刊论文 [杨健吾. YANG Jianwu 基督教在四川藏族地区的传播 -宗教学研究2004, ""\(3\)](#)

本文扼要地论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四川藏区传播的概况,总结其传播的手段和特点主要是:广泛收集各种情报,以尽快熟悉中国社会;广设教堂,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广占土地和房屋,以地租、房租进行剥削,作为教会重要的经济来源;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始终是在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藏传佛教信仰的冲突中进行的。与传教士们长期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较,基督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是不成功的。此中原因发人深省。

10. 期刊论文 [陈伟 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概况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 ""\(3\)](#)

本文从几个历史时期介绍中国基督教圣诗的发展概况,着重介绍基督教新教的圣诗。从中国基督教圣诗发展的几个时期来看,初期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扬基督教时,也将西洋文化灌入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所唱的圣诗都是西方译品,而且与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相冲突,以致中国人把基督教视为“洋教”。此后,对于怎样用中国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基督教徒真实的宗教情感,中国人做了很多的尝试,走了一条圣诗本色化的道路。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rsfzdgzxxx20080601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3dcd3833-bf1e-4557-8a3c-9e4d007102cb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